

文

论

ZHONG GUO
GU DAI WEN LUN
JIAO CHENG

中国 古代 文论 教程

蒋 凡 郁 源 ● 主编

Jiang Fan Yu Yuan

中国书籍出版社

程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蒋凡 郁沅 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蒋凡,郁沅主编.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4.8

ISBN 7 - 5068 - 0393 - 3

I . 中… II . ①蒋… ②郁… III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古代
- 教材 IV . 1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07903 号

书 名 /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书 号 / ISBN 7 - 5068 - 0393 - 3/G · 208

责任编辑 / 游 翔

责任印制 / 王大军 刘颖丽

封面设计 / 恳星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100073))

电 话 / (010) 63455164 (总编室) (010) 63454858 (发行部)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9 印张 477 千字

版 次 /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 10001—13000 册

定 价 / 27.00 元(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参加编写单位

华南师大中文系 杭州大学中文系
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 四川师院中文系
新疆职工大学中文系 徐州师大中文系
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辽宁师大中文系
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 复旦大学中文系
河北师院中文系 内蒙师大中文系 河南大学中文系
安徽大学中文系 复旦大学语文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文管学院 南开大学中文系 山西大学中文系
黄冈师专中文系 烟台大学中文系 湖北大学中文系
华东师大中文系 上海长宁教育学院 湖北师院中文系

(以作者姓名出现先后为序)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序

蒋孔阳

由蒋凡、郁沅两位同志担任主编，全国二十多所高等院校教师共同参与编写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一书，快要出版了。蒋凡同志来，代表郁沅同志，要我写篇序。他们两位，是我多年的挚友。为人与为学，素为我所敬重。情谊所在，不好推辞。但我不搞中国古代文论，我能写什么呢？无以，我听了蒋凡同志的一席话，谈谈感想，敷衍成文，不知能充数否？

首先，《中国古代文论教程》深浅适中，繁简得当，适合目前高校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要。解放以前，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三位先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创探索，成绩斐然。但他们的对象，是当时国学根基较为深厚的师生。解放以后，已不大合用。新编的教材，或者只有十来万字，点面结合不够，未能餍足学生的需要；或者越写越长，从六七十万字发展到洋洋洒洒数百万字，这又大大超过了学生的负担。现在这本《教程》，参加编写的有年老的教授，也有年轻的讲师，他们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无论课时的安排，教学内容的深浅繁简，以至学生的接受能力等等，都力求符合实际，以有利于教学的进行。

其次，从编写体例看，本《教程》也颇具创新意识。解放以后，有的院校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以阐述古文论的历史发展为主；有的开设中国历代文论选，以介绍作家作品和理论发挥为主；

有的同时开设上述两门课程，各讲各的，似有分割之势。实际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中国古代文论发生、发展的历史，批评史与古文论，二者有机统一，不可须臾分离。有鉴于此，所以本《教程》另创体例，充分发挥以史带论、史中有论、史论结合的特点。在古文论研究中，如何把历史研究与现代视角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目前学术界共同关心的一个热点。《教程》在这方面应当说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一方面，作者在实证功夫的基础上，力求言之有据，把古文论纳入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美学思潮中去考察，并结合古代的创作实践，去解读文本，以便正确理解古文论的特殊概念、范畴和纷繁变化的种种现象，历史地把握其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作者并不为古而古，而是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来重加审视，以便“以史为鉴”，为建设全新的现代文论提供必要的借鉴，从现代视角来看，《教程》不仅是在追踪古人，同时也在追踪时代，追踪古人在自己的时代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影子。

第三，宏观的理论概括与微观的深刻钻研相结合，应是《教程》的另一大的特色。《绪论》一章，开头就从宏观角度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等问题，具体内容，尚可商榷，但如此开篇，高屋建瓴，涵盖面广，把读者一步步引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后面再以时序分章节，各个时代，先有《总论》，以宏观的描述，尽可能说明该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容与特色；然后是讲述具体内容的章节，以点带面，形成完整的历史发展图景。这样，大纲细目，层次明晰，读者既可获得完整的歷史概貌，又可深入具体作家作品的探讨。

第四，立论力求公允朴实，富有辩证眼光。两位主编历来认为，凡是历史上久经考验的古典作家或作品，它们尽管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只要它们存在下来，它们就有存在的理由。例如明清诗坛的格调、性灵、神韵三派的理论争讼，相互批判，此起彼落，但本《教程》并不因此而厚此薄彼，或是标榜一家而抹

煞其余，而是指出它们都是特定文化背景中特种时代思潮的结晶，各有自己特殊的贡献。

最后，本《教程》在具体篇章的评讲上，也是精彩纷呈，自有特点。如开篇对《周易》的评讲，就颇具新意。在儒家十三经中，《易》居群经之首。艰深难读，历代学者视为畏途。但本《教程》却知难而进，根据实际情况，深入探索，并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周易》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深远影响。言之有理，令人信服。又如最末一节《近代文学总论》，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近代文论的历史发展，并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指出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应当近代化的问题，立论有深度，对人有启发。

《教程》即将出版，令人心向往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不仅文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文论在世界上也是自成体系，自有特色。怎样发扬中国文论的中国特色，实在是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所应当努力的方向！

蒋凡同志是郭绍虞、朱东润先生的入室弟子，郁沅同志是杨晦先生的高足，他们学有所传，根底甚厚。虽然历尽坎坷，耽误甚多，但仍自强不息，卓有成就。由他们来主编这部《教程》，自然驾轻就熟、不同一般了。

责任编辑●游 翔

封面设计●恩 墓

目 录

绪论

- | | | |
|-----|---------------|---|
| 第一节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 | 1 |
| 第二节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 | 8 |

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学理论

- | | | |
|-----|-------|----|
| 第一节 | 总论 | 13 |
| 第二节 | 《周易》 | 34 |
| 第三节 | 孔子 | 43 |
| 第四节 | 庄子 | 49 |
| 第五节 | 《毛诗序》 | 59 |
| 第六节 | 王充 | 64 |
| 附录 | 文论资料 | 70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

- | | | |
|-----|------|-----|
| 第一节 | 总论 | 79 |
| 第二节 | 曹丕 | 98 |
| 第三节 | 陆机 | 104 |
| 第四节 | 葛洪 | 112 |
| 第五节 | 沈约 | 118 |
| 第六节 | 刘勰 | 123 |
| 第七节 | 钟嵘 | 137 |
| 附录 | 文论资料 | 146 |

第三章 唐宋金元文学理论

第一节	总论	166
第二节	皎然	189
第三节	韩愈	194
第四节	白居易	201
第五节	司空图	207
第六节	苏轼	217
第七节	江西派诗论	227
第八节	朱熹	235
第九节	严羽	240
附录	文论资料	250

第四章 明清诗文理论

第一节	总论	267
第二节	谢榛、王世贞与前后七子	287
第三节	袁宏道与公安派	292
第四节	王夫之	301
第五节	叶燮	311
第六节	王士禛“神韵”说	321
第七节	沈德潜“格调”说	331
第八节	袁枚“性灵”说	337
第九节	姚鼐与桐城派	344
第十节	浙西派与常州派词论	354
附录	文论资料	367

第五章 明清戏曲理论

第一节	总论	389
第二节	徐渭	403
第三节	吴江派与临川派	408

第四节	王骥德	416
第五节	李渔	427
附录	文论资料	441

第六章 明清小说理论

第一节	总论	450
第二节	李贽	471
第三节	金圣叹	480
第四节	毛宗岗	493
第五节	张竹坡	500
第六节	脂砚斋评《石头记》	508
附录	文论资料	517

第七章 近代文学理论

第一节	总论	535
第二节	刘熙载	548
第三节	梁启超	559
第四节	王国维	569
附录	文论资料	584

后记 596

□绪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

纵观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历史，显然存在着中国古代至近代和从古希腊古罗马至近代欧洲的东西两大思想文化体系，它们都蕴含丰富的文学理论遗产。由于长期以来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以及我们自身研究的不足，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一座有待深入开掘的理论宝库。因此，对它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就成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丰富世界文论宝库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形态文学理论体系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民族特色的形成，是离不开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等诸因素的影响的。

(一) 与中国古代长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大体同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独具一格，有其正确性与深刻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所制约和决定的。根据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从春秋时代至旧民主主义革命结

束的三千年左右的漫长岁月，约有二千年（或更多的时间）处于封建社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基本上与它同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于它以农业经济为主，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不发达，带有封闭性，社会组织机构相对稳定，变革迟缓。这样，一方面固然创造了欧洲中世纪难以媲美的封建社会精神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延缓了精神生产领域的变革过程。与此基本一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汇小溪而成江河，自成一体，具有很高的水平。从表面上看，它们往往是随感而发的，缺乏系统性，没有什么体系，但历史地、综合地看，它们又是世代相承、彼此连贯、共成体系的。这个体系，我们既要看到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深入揭示文学自身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规律，有其正确性和深刻性；同时又要看到难免有其落后性与保守性。这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通俗文学如戏剧、小说始终未能取得像欧洲那样的正宗地位，对它们的研究始终受到排斥和歧视，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小说、戏剧已在城市普及，理论研究也取得重大成就，也难免如此。二是尽管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有了萌芽和发展，也发生了性质近似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思潮，但最终敌不过浓厚的传统封建势力，不久便低落了。到了清朝，由于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以致文学理论的研究及其成就，主要停留在对传统思想资料的汇集、整理和总结，缺少革新，更没有像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那样把传统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提高到具有现代的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理论体系的高度。

（二）由于社会的农业性和宗法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二者

的和谐一致。

先秦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法天贵真的宇宙观和审美观正是其产物。道家的这方面思想在魏晋时期发展为玄学，它与东汉以后传入我国的佛教思想融合，共同对中国古代的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古代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所追求和表现的人与自然的交融冥合而获得的意境情味，在古代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比兴说”、“物感说”、“意境说”、“神韵说”等等，无不与此相关。又由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与社会活动是以家庭、家族和血缘氏族为单位，社会也就具有宗法性。在这种宗法关系中，人与家庭、家族、血缘氏族命运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自商周以来早已形成一套由儒家总结的、以忠孝为核心、旨在维系家庭氏族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它要求个人先是自我修身养性，学道好礼，在家庭宗族孝敬父兄长辈，使人伦和谐，进而忠君报国，实现家庭、宗族和国家社会的安全昌盛，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受此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道德内容，强调“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悲剧意识薄弱（不少悲剧往往夹上大团圆的尾巴），强调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作用，把文学视为教化工具，鼓吹“文以载道”。从先秦到两汉所形成的儒家的文学教化论长期以来在文坛高踞统治地位，而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潮虽有出现，甚至在南北朝时期愈演愈烈，但其后便受到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的一致讨伐。此后再也没有得到像西方那样的发展机会。这也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土壤所产生和形成的儒、道两大思想传统，均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大致说来，儒家的影响“主要在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如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学与现实生

活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等等方面”^①；而道家（含玄学和佛教）的影响则“主要是在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即文学的构思与创作、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的风格等等方面”^②，而且两者在文学家和文论家的身上“往往是兼收并蓄，‘外儒家而内释老’”。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的由于是商业性和宗教性的社会而偏重于人与自然的对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个人的价值、权益而形成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迫切感、崇高感和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前途的抗争、奋斗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悲剧意识，而文学的作用则偏重其认识作用（这也与西方的科学精神一致）。

（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

受中国古代传统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也有多义性。它所运用的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概念，一方面能够深刻揭示文学现象的规律，包含丰富的艺术辩证法思想，令人读来具体、亲切，富有美感，但另一方面概念、范畴意义不够明确，分析归纳逻辑不够严密。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代早在先秦已经形成了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重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征服，故重在宇宙的客观构成规律，努力运用明确的概念、范畴探究事物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则偏重人与自然的统一，它看到宇宙的变化无穷和事物的运动转化，却忽视其构成规律与逻辑关系，偏重整体的、直观的把握，忽视精密的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如对中国古代

① ②张少康：《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问题》，见《古典文艺美学论稿》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25

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先秦道家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以物观物”（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在道家看来，宇宙是浑然一体、自然纷呈、变化无穷的，因此人们难以运用概念、范畴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如老子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一章），意谓人们可以运用语言概念说明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因为作为最高宇宙本体的“道”，本来无形无迹，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它是不可能用语言概念说明的。庄子进一步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在他看来，事物的精微之处是不可能运用语言概念描述说明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他提倡“意致”，即感悟式直觉思维，追求“得意忘言”的感悟境界。魏晋的玄学家王弼则把它发挥为“寄言出意”的体道明道的思维方式，其后为佛教徒所接受，提出了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说。这种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与鉴赏中的思维不应赤裸裸展示，而是应该运用具体感性形象，通过暗示、象征，诱发读者的联想的形象思维是一致的。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以形写神、虚实相生、情境交融等创作理论显然是对这一思维方式在创作实践中具体运用的理论总结。这种感悟式的直觉思维重在整体的直观把握，不同于西方的偏重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它虽已上升为理性，但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理论时，所特有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如文气、韵味、风骨、意境、风雅、比兴、阳刚、阴柔等等，也就并非像西方那样先作一番明确的界定，然后步步为营，经过严密的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多起源于感性体验，又经过有如电光火石的感悟，后又约定俗成，代代沿用的逐步明确、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相结合的特点。它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个人、流派那里，其内涵既有差异性、多义性，但又有历史的连贯性、一致性。如“味”，本是饮食之味，原属感官体验。《左传·

昭公九年》：“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意思是说，饮食之味会影响到人的精神状态，进而扩大到语言文字的运用。汉时人们不时把饮食的体验与审美体验相提并论，魏晋以后则直接把它移用于文学的鉴赏。到了唐代的司空图，更是以“辨味”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诗学理论。又如“风骨”，原是指人的神情骨相，用于品鉴人物。至沈约、刘勰、钟嵘用于文学评论。由于对它并无严格的界定，因而不同的人运用时也就会有差异性。对《文心雕龙》所说的“风骨”的具体含义，多年以来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细考上述三家及后来的严羽、殷璠、陈子昂、王士禛诸家之论，所谓风骨，则大致是指作品情感饱满、内容充实、风格劲健爽朗，富有感染力，说明它是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不过，由于概念、范畴内涵的多义性、模糊性，它们之间又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也就为我们理解、探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对它们进行一番清理，找出其相对一致的意蕴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成了一项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前提和紧迫的工作。

同时，中国古代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正是其思维成果。因此，它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深入揭示文学现象自身的诸因素之间的规律。如它既强调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治乱兴衰、政治得失、风俗民情的相互影响，运用了美刺、诗教、兴观群怨等范畴去揭示其规律；又在考察文学现象时把它看成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因素的矛盾的统一体，并运用质与文、情与景、意与象、虚与实、动与静、繁与简、正与奇、雅与俗、形与神等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揭示，把它们之间看成是相辅相成、互相转化、缺一不可的，因而充满了生动、丰富的艺术辩证法，能够深入地揭示文学的本质特点及其内在联系。